

目 录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综述	(1)
一 名家研究的几个历史阶段	(1)
二 名家研究中的几种代表性观点	(5)
三 名家研究中的几种方法和思路	(7)
四 对名家研究现状的综合评价	(9)
第二节 研究内容、范围与方法	(10)
一 研究内容与范围	(10)
二 研究方法	(11)
第一章 “名”的自觉与名家的产生发展	(13)
第一节 先秦名辩思潮的社会文化背景及其中心问题	(13)
一 名辩思潮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	(13)
二 “名”的起源与名辩思潮的中心问题	(16)
第二节 先秦哲学中“名”之内涵嬗变	(18)
一 “名”的自觉与“名学”的产生	(19)
二 “名”的超越与抽象	(21)
三 “名”之形上性和独立性的确立	(24)
四 政治“正名”的复归与先秦名学的终结	(27)
第三节 名家的产生和发展脉络	(30)
一 先秦是否存在名家学派	(30)

二	名家的起源与发展脉络	(33)
三	名家的派别考察	(38)
第二章	名家四子哲学思想探赜	(44)
第一节	邓析“刑名之辩”的哲学致思	(44)
一	邓析与《邓析子》考辨	(44)
二	“两可”之说	(47)
三	“刑名之辩”与《邓析子》中所体现的名实观	(50)
第二节	惠施“历物之意”的哲学意蕴	(52)
一	惠施考辨	(52)
二	“善譬”的方法论思想	(55)
三	“历物十事”解析(上)	(56)
四	“历物十事”解析(下)	(62)
第三节	尹文“形名”哲学思想探析	(67)
一	尹文及《尹文子》考辨	(67)
二	“形”、“名”相分	(70)
三	“名法”与“正名”	(74)
第四节	公孙龙“离坚白”哲学思想发微	(81)
一	公孙龙及《公孙龙子》考辨	(81)
二	“名”与“实”	(86)
三	“白马非马”	(89)
四	“离坚白”	(94)
五	“二无一”	(100)
六	“物”与“指”	(105)
第三章	比较视域下名家与各家哲学的关系	(112)
第一节	名家与儒家比较研究	(112)
一	名家四子与儒家的关系	(112)
二	荀子对名家思想的双重态度	(115)
三	儒名“正名”思想之差异	(118)
第二节	从庄惠之争看道家与名家思想的异同	(121)

一 “道”、“物”与存在之争	(122)
二 “知”、“乐”与认知之争	(125)
三 “齐物”、“合同”与方法之争	(127)
四 “逍遥”、“泛爱”与人生观之争	(129)
五 从庄惠之争看道家与名家的异同	(131)
第三节 名家与后期墨家的譬应	(132)
一 “名”、“实”之争	(133)
二 “离”、“盈”之间	(135)
三 “同”、“异”之辩	(140)
第四节 名家与法家比较研究	(145)
一 法家“刑名”思想之内涵	(145)
二 名家思想对法家的影响	(148)
三 名法两家“正名”思想的异同	(151)
第四章 现代哲学视域下的名家哲学问题	(154)
第一节 名、实二元存在论	(154)
一 概念与实在	(155)
二 现实与潜在	(157)
三 个体与共相	(158)
四 名、实共存	(160)
第二节 主客二元的认识论	(162)
一 认识的主体意识	(163)
二 从感官经验到理性思辨	(165)
三 思想的客观性	(168)
第三节 理性思辨的方法论	(170)
一 察、辩的复合方法论	(170)
二 “两可”的辩证思维	(173)
三 抽象概念分析法	(175)
第四节 分析的语言哲学	(178)
一 对语言问题的自觉	(178)
二 名的符号特征	(180)

三 语言与意义	(183)
第五章 名家哲学的理论特质与历史命运	(188)
第一节 名家哲学的理论特质	(188)
一 反常识的怀疑论立场	(188)
二 非伦理、非实用的外在超越性	(190)
三 重“知”、求“真”的客观主义立场	(192)
四 重“分”的理性思维方法	(194)
第二节 名家哲学的历史命运	(196)
一 名家的历史地位与影响	(196)
二 名家哲学消亡的原因	(197)
三 名家哲学研究的当代意义	(199)
参考文献	(201)
后记	(211)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综述

名家是先秦时期百家争鸣中的重要哲学派别。汉代的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把诸子百家划分为六个主要学派，第一次提出“名家”这个称号，用来特指先秦名辩思潮中“专决于名”的一批“辩者”之流。后来班固在《艺文志》中又沿用刘向、刘歆的分类法将先秦诸子分为十个主要派别，名家也位列其中。由于名家哲学“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脱离了主流的实用主义传统，被视为“怪说琦辞”，最终不见容于社会和主流思想界而逐渐消亡。鸦片战争以来，伴随着西学东渐的步伐，在中西“体用”之争的背景下，名家思想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迎来了“复苏”的契机。

一 名家研究的几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西汉至清末民初，名家的思想被定性为“苛察缴绕”的“琦辞怪说”，基本上处于无人理睬的状态。仅有的部分研究也只是对《公孙龙子》等名家著作进行一些考辨、注释和批判。

司马谈批评名家说：“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史记·太史公自序》）班固也认为：“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

不顺则事不成。’此其所长也。及警者为之，则苟钩（鉤）析，乱而已。”（《汉书·艺文志》）司马谈和班固虽然也承认名家“正名”思想的合理性，但他们更注重的是对名家“苛察缴绕”和“专决于名”的批判。《史记》和《汉书》的这两段总结成为此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对名家思想的主流评判标准。晋人鲁胜认为名家诸子及其思想从属于墨家学派，并将名家思想亡绝的原因归结为其思想本身的艰深晦涩。现存的《道藏》本《公孙龙子》附有注释，据考为宋人谢希深所作，所解基本不通。南宋时期黄震、陈振孙，明朝时期宋濂等人站在《史记》和《汉书》的立场试图对名家思想的艰深晦涩进行描述和解读，但与名家思想旨趣相去甚远。清代研究者对先秦名家诸子也甚多贬恶之辞。不过在清朝的考据之学兴起的背景下，也有部分学者对名家诸子主要是公孙龙的思想进行了考据和解读，出现一批注解性著作，如孙诒让著《公孙龙子札迻》、俞樾著《读公孙龙子》、陈沆著《公孙龙子注》等。

第二阶段，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名家研究进入一个相对繁荣的时期，出现了一批重要的研究专著和成果。这个时期名家研究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方面，部分学者继续运用考据、训诂和义理的方法对名家诸子及其著作进行研究、解读；另一方面，一些接受过西方哲学训练的学者运用哲学和逻辑学的眼光看待以“名”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名家学派，解剖名家的“诡辩”和“琦辞”。

对名家进行考据性研究的代表成果有：钱穆在《惠施公孙龙》和《先秦诸子系年》中运用传统的考据和训诂方法对名家诸子的生平事迹和思想进行考证和阐释。胡道静著有《公孙龙子考》一书，对公孙龙的生平事迹、朋辈子弟、年表、著作和坚白、同异、无厚等论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陈柱的《公孙龙子集解》广泛采用诸家注释成果，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在某些地方也有自己的见解。郭湛波在《先秦辩学史》中用“辩学”一词代替“名学”或“形名学”，提出“形名学”就是中国的逻辑学。他所谓“形名学”的研究对象是邓析、惠施、公孙龙、《墨辩》和荀子的正名。谭戒甫在《公孙龙子形名发微》中，认为公孙龙子是形名家，把惠施和墨家视为“名家”。他从学微、理诠、流别、评证、诡辩等方面对名家学派进行了深入研究，对《公孙龙子》一书进行了全面诠释，是研究名家和《公孙龙子》的一部重要著作。王琯的《公孙龙子悬解》综

合各个时代关于公孙龙子的研究观点，对《公孙龙子》进行了全面的训诂和解释，频见新意。王启湘作《周秦名家三子校诂》，对名家著作进行了细致考证和梳理。

对名家进行哲学与逻辑研究的代表成果有：胡适在《先秦名学史》和《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泛论包括惠施、公孙龙在内的先秦“名学”，按照西方哲学的方法整理先秦逻辑史，对先秦逻辑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做了细致阐述，并对诸子的逻辑理论和方法加以分析，对先秦逻辑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影响。不过胡适并不承认先秦有“名家”存在，他把公孙龙视为“别墨”一派，并用后期墨家的观点来解释公孙龙的命题。虞愚在其《中国名学》中尝试用形式逻辑的方法，把先秦名辩学分为“无名”、“正名”、“立名”、“形名”四派，并对各派的代表人物及思想进行探讨。他把惠施和公孙龙视为“形名”一派。冯友兰用新实在论的观点来分析名家论题，认为名家所做的是“专决于名”的“纯理论”思考，他用共相与个相、一般与特殊的关系理解《公孙龙子》，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为后来的研究树立了典范。他将先秦名家分为“离坚白”、“合同异”两派，指出惠施和公孙龙的思想差异。郭沫若认为名辩是先秦各家都采用的一种学术手段，并不仅仅限于名家。他认为先秦名辩思潮“导源于简单的实际要求，即儒者的‘正名’；其后发展而成为各派学说的争辩，一部分的观念论者追逐着观念游戏的偏向，更流为近于纯粹的诡辩；在其后各家的倾向又差不多一致地企图着把这种偏向挽回过来，重新又恢复到‘正名’的实际。”^① 伍非百搜集了先秦史籍中几乎所有关于“名家言”的资料，把先秦诸子中研究“名法”、“名辩”、“名理”等有关著作和论述均纳入其中，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他不仅对这些资料进行了详细的考证，还以逻辑学的观点对儒、墨、道、名、法各家的相关资料进行系统分析，突破传统考据的局限，多有创见。侯外庐和杜国庠等人在《中国思想通史》中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对名家学派和《公孙龙子》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名家是唯心主义的诡辩论者，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十分浓厚。庞朴认为公孙龙的学说是“诡辩学说”，公孙龙“只是留下了几

^① 郭沫若：《十批判书》，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62页。

丝启人智慧的思想轨迹，并以此构成了中国哲学史上独具风格的一页”。^①他认为《公孙龙子》原本就只有六篇，现在流传的版本是完本，这个考证在学界独树一帜。港台当代新儒家的三位代表人物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也对名家研究有所涉及。唐君毅在《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中对公孙龙的论题做了详细的论述，并试图提供一个融贯一致的解释。徐复观著有《公孙龙子讲疏》一书，其成就主要体现在思想史上。牟宗三在《名家与荀子》一书中运用逻辑学和哲学知识对惠施、公孙龙、辩者二十一事、荀子等人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对先秦名家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逻辑学界的许多学者也十分重视名家逻辑学，多部中国逻辑史著作中都把名家列为重要研究对象，对名家进行深入探讨。代表性的有沈有鼎、温公颐、周云之、周山、孙中原等人的逻辑史著作。周昌忠在《公孙龙子新论》中认为《公孙龙子》是一个思辨的语言分析哲学体系。他利用语言分析哲学的理论从本体论、认识论、语言哲学、逻辑学等四个方面对《公孙龙子》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对于推动公孙龙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他在另一本专著《先秦名辩学及其科学思想》中对先秦名辩思潮中诸子特别是后期墨家和公孙龙的哲学思想进行了详细分析，并指出名辩学中包含的科学思想。崔清田主编的《名学与辩学》立足于冲破以西方传统形式逻辑为模本去解释和重构中国名学与辩学的思路与方法，对名学与辩学进行了历史分析和文化诠释。

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名家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人们开始用语言学、符号学等“新工具”对名家进行研究和解读。林铭钧、曾祥云的《名辩学新探》采用现代符号学理论，对名学和辩学进行了新的探讨。香港学者冯耀明著有《公孙龙子》一书，从分析哲学的观点出发，应用一阶谓词逻辑的方法分析《白马论》全篇的结构，使用当代西方分析哲学家如奎因、克里普克等人的理论来探究各篇隐含的指涉理论和存在问题，是一种比较全面的分析和解释。台湾学者刘福增在其专著《公孙龙子新论》中认为从比较严格的标准上来看，《公孙龙子》一书“无疑是语言哲学（但不是逻辑，尤其不是演绎逻辑）高水准的开创之

① 庞朴：《公孙龙子研究》，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7页。

作”。^① 他首先对《公孙龙子》各篇文本进行了字句的梳理和分析，然后用现代逻辑的语言和形式对各篇的论证与观点进行了整体分析与批评，最后对学界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了检讨和批评。朱前鸿的《先秦名家四子研究》试图用符号学的相关理论对先秦名家学派的思想作一全面的探析，探寻名家四子的思想及其内在的“逻辑”和“方法”。刘利民著有《在语言中盘旋——先秦名家诡辩命题的纯语言思辨理性研究》一书，从西方语言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理论出发，创建了认知操作三模式的整合性理论框架，并以此为出发点，详细地解读惠施和公孙龙的纯语言思辨理性，试图为名家洗清“诡辩”的罪名。

二 名家研究中的几种代表性观点

第一种观点，不承认先秦有所谓名家学派的存在，把名家诸子归为后墨学派。这种观点肇始于晋人鲁胜。他在《墨辩注序》中说：“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以正别名显于世。”^② 清人陈沆、孙诒让等人均认可鲁胜的观点。胡适继承了惠施公孙龙之学出于墨学的观点，认为惠施公孙龙即《庄子·天下》所谓的“别墨”一派，并且说“古无‘名学’之家，故‘名家’不成为一家之言”^③。他认为所谓“名学”（逻辑）是一种为学方法，家家都有“名学”，所以没有什么名家。^④ 梁启超也说：“惠施公孙龙，皆所谓名家者流也，而其学实出于墨。《庄子·天下篇》云：‘墨者俱诵《墨经》，而倍谯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觭偶不侔之辞相应。’《墨经》言名学过半，而施龙辩辞，亦多与《经》出入。《天下篇》举惠施推论十事，而归于‘泛爱万物，天地一体’；公孙龙亦尝劝燕昭王偃兵，可见两家皆宗墨学。胡适谓《天下篇》所谓‘别墨’即施龙一派，可谓特识。”^⑤ 虞愚也同意胡

① 刘福增：《公孙龙子新论》，文津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②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册《卷九十四·隐逸》，第2433页。

③ 胡适：《诸子不出王官论》，《古史辨（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页。

④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35页。

⑤ （清）梁启超：《墨子学案·附录一》，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165页。

适的观点,认为“‘别墨’亦即‘形名家’”。^①郭沫若认为“‘名家’本来就是汉人所给予的称谓。在先秦时代,所谓‘名家’者流每被称为‘辩者’或‘察士’。察辩并不限于一家,儒、墨、道、法都在从事名实的调整与察辩的争斗。”^②这些学者均把名家的两大重要人物惠施、公孙龙之学归于墨学,实际是否认先秦名家学派的存在。

第二种观点,认为先秦有名家存在,不过所谓的名家不仅仅局限于《艺文志》中所列的几人,而是泛指先秦名辩思潮中参与“名”之讨论的人。谭戒甫说:“名家之学,多传墨徒;名家之书,亦在《墨子》。”^③他虽然承认先秦确有名家一派存在,但是他所谓的名家指著有《墨经》的后墨学派,而以惠施公孙龙为代表的学派被他称为“形名家”。他认为形名家只认有物质形,不认有物之实,其理论类似于西方柏拉图和斯宾诺莎的“不可知论”。^④伍非百则认为先秦名家包括“名法”、“名理”、“名辩”三派,《艺文志》所列的“名家”即“形名家”,主要是指“名辩”一派。^⑤温公颐也认为先秦名家并不限于《艺文志》所说的惠、邓一派,而应广泛地包括所有名辩学派的人在内。^⑥这种观点被逻辑学界许多学者所认可。

第三种观点,承认先秦有名家学派存在,但是认为名家是先秦名辩思潮中的诡辩论者,名家诸子是唯心主义者和形而上学者。侯外庐等人合著的《中国思想通史》中认为两汉史家“定立‘名家’一派,大体近于史实”^⑦。他们认为先秦名辩思潮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以墨家、荀子、韩非为代表的向上的发展,另一方面是以思孟学派、庄惠和公孙龙、邹衍等为代表的向下的堕落。在他们看来名家思想丧失了名辩思潮的积极内

① 虞愚:《中国名学》,《民国丛书》第四编第9册,上海书店1992年影印本,第98页。

② 郭沫若:《十批判书》,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61页。

③ 谭戒甫:《公孙龙子形名发微》,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99页。

④ 同上书,第3页。

⑤ 伍非百:《中国古名家言》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

⑥ 温公颐:《先秦逻辑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

⑦ 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17页。

容，蜕变为概念游戏的“诡辩”。^①名家内部惠施代表了相对主义唯心论一派，公孙龙代表了绝对主义唯心论一派。杜国庠在《读公孙龙子》一文中认为公孙龙建立了“纯逻辑的正名实理论”^②，避免了诡辩论者的通病。但他还认为公孙龙哲学是“多元的客观唯心主义”^③。庞朴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角度，批判公孙龙的“白马非马”、“离坚白”、“二无一”等观点，把公孙龙的学说定性为唯心主义诡辩论，把名家定性为代表落后的奴隶主阶级思想的诡辩学派。

第四种观点，承认先秦有名家学派的存在，并且认为名家诸子是异于儒、道、墨、法等其他各家的、专决于名理的哲学家，在先秦哲学史、逻辑史、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随着名家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肯定先秦确实存在着“专决于名”的名家存在，其思想有着很强的逻辑性，不是所谓诡辩，而是具有深刻内涵的哲学思想。冯友兰、牟宗三等人均持这种观点。随着研究的深入，这种认识逐渐成为学界的主流观点。

三 名家研究中的几种方法和思路

从西汉开始名家研究经历了两千多年，但真正意义上的名家研究是从清朝末期才开始。综合一百多年来的名家研究历史，不同的时期学者们利用不同的方法对名家思想进行研究，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传统的考据、训诂、义理研究法。由于名家的论题和著作晦涩难懂，一直被认为是“怪说琦辞”，很少有学者主动来研究它们。在清末民初这段时期，受考据学遗风的影响，一些学者对名家的著作、论题进行逐字逐句地考证和义理疏解，为后来的研究做了很好的基础铺垫工作。在他们的努力下，先秦名家诸子典籍渐渐露出其真实面目，变得基本可读可懂。从这个意义上说，考据学对于名家研究所作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然而早期对名家的研究，仅仅停留在字句的疏解、考证、训诂、校勘等方

① 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19页。

② 杜国庠：《杜国庠文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26页。

③ 同上书，第125页。

面，对名家思想的整体把握不是流于虚空，就是有很大的理解偏差。单纯从训诂和义理的角度来看，学界前辈已经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注解资料。在没有更多地掌握新的资料 and 没有很好的古文字考据训诂功底的情况下，再一味地从这个角度入手，容易受制于前人研究成果，往往只能是拾人牙慧，很难有新的突破。

第二，运用西方哲学、传统逻辑学进行比较研究。自从胡适的《先秦名学史》发表以来，这种研究方法俨然成为名家研究的主流。一些学者侧重于利用西方哲学体系和问题框架开展研究，提出名家哲学中所包含的本体论、概念论、认识论、语言哲学思想等，认为名家是先秦思想史上最注重思辨理性的学派。另外中国逻辑学界为了构建中国自己的逻辑史和逻辑学，深入挖掘以后期墨家和名家为主要代表的先秦逻辑资源，认为先秦名家是在讲逻辑，名家和后期墨家一样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逻辑学家。这两种研究方向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他们的努力下，名家基本摆脱了“诡辩”、“怪说琦辞”的罪名，向我们展示出其理性思辨的哲学风采。这种方法的不足之处是容易削足适履。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无论是从唯物唯心的框架还是从逻辑学、科学思想的角度来解释名家哲学，均可能导致“预成论”，即先设定好理论框架，然后从名家著作、命题和其他相关资料中抽取适合这一框架的内容来解读，而对于名家那些不能纳入框架或者不容易被这一框架所理解的资料，或模棱两可，或语焉不详，或干脆存而不论。这样名家思想面临着被“肢解”的危险，妨碍我们理解和把握名家哲学思想的整体。

第三，运用语言学、现代逻辑、符号学等新工具进行研究。这是一种比较新的研究方法。一些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利用传统形式逻辑体系和诠释模式研究名家往往显得比较牵强附会，并且对许多问题难以解决。他们认为把具有生动内容和独特风格的名家学说放在西方形式逻辑框架中简单比附，把具有浓厚语言文字特色的名辩学说归结为西方的传统语形模式，并不能彰显名家思想和名家语言的特色。因此，这些学者采用语言学中的语义学、语用学和现代符号学等理论，重新探讨和评价名家哲学及名辩学。他们认为，名家及名辩学从整体上不是逻辑尤其不是传统演绎逻辑，而是一种语言哲学思想，是关于语言的理性思辨思想，是关于语言词项符号的理论。由于这种研究方法出现得较晚，相关研究成果不是十分丰

富，研究也不是很深入，一些学者还停留在用西方语言学和符号学理论简单比附名家学说的阶段，因而不能武断地对这个方法下结论。但是这种研究方法至少能为名家研究提供一条新的思路，提醒我们可以从中国传统的言意之辩等角度来理解名家学说。至于能不能成为名家研究的新突破口，还需假以时日。

四 对名家研究现状的综合评价

百年来的名家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历史上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澄清了名家“诡辩”的罪名，基本理清了名家的发展脉络。近现代的名家研究，由于在理解上下工夫，对名家诸子的学术思想有了整体性的理解和把握，比较清楚地认识到名家代表人物学术思想的前后相继关系，为深入研究名家思想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学界逐渐对先秦时期确实存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专心于理性思辨的名家学派形成了共识，并对名家学派的发展脉络有了基本的理解。例如学界对邓析首开名辩风气的原因和他在“两可”中透露出的辩证思维方法进行详细分析，确定他在名家学派中开创者的地位。利用这条逻辑思维的线索去理解惠施的“历物十事”和辩者“二十一事”，证明他们是邓析“两可”思想的延续、发展和运用。尹文的“形名”和“名家”的正名理论正是从“政治正名”向公孙龙“专决于名”转变的中间环节。一些学者通过大量的考据、注释，使得艰涩难懂的《公孙龙子》逐渐显露出其真面目。结构紧密、富有逻辑的五篇文字显示出公孙龙作为名家集大成者的独特理论风采。

第二，对名家著作进行了仔细的清理，使得名家的论题、术语得到了比较好的解释。近现代的名家研究，由于利用西方哲学和逻辑学作为比较的工具，对名家的名词术语、基本思想进行比较和解释，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公孙龙的“白马非马”，历来研究者众说纷纭，难得要领。如果我们运用西方逻辑学中“内涵”、“外延”关系以及概念之间的种属关系等理论加以分析，就变得浅显易懂；我们利用“共相”与“个相”、“一般”与“特殊”的理论来理解《坚白论》和《指物论》，就会发现这些“硬骨头”变得不再那么难啃。

然而，名家研究中也存在一些不足。有些学者在利用西方哲学和逻辑学工具对名家著作和命题进行阐释和评价时，时有牵强附会、削足适履的情况。一些学者在对名家著作及其思想进行解释时多有主观随意的毛病。有些学者忽视了名家发展的特点，对名家思想的研究缺少整体性的把握等等。如何把名家哲学思想作为一个整体，分析其在先秦哲学史乃至整个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将是我们接下来要面临的重要课题。

第二节 研究内容、范围与方法

一 研究内容与范围

《汉书·艺文志》名家条下共列邓析、尹文、公孙龙、成公生、惠施、黄公、毛公七人，其中成公生、黄公、毛公三人已无迹可考。另外先秦典籍中有记载的其他可能归属于名家学派的人物如桓团、兒说、田巴、綦毋子等人，也都不可详考。就我们现在掌握的材料来看，属于名家并有籍可考、有研究价值和意义的仅有邓析、惠施、尹文、公孙龙四人而已。而在这四人中间，惠施的著作已经失传，我们对他的研究只能依靠《庄子·天下》篇中所记载的“历物十事”为主要材料。除《公孙龙子》之外，关于《邓析子》和《尹文子》的真伪问题学界一直辩论不已，未能达成共识。另外一些学者还认为先秦时期并不存在名家学派，他们将名家诸子或归为后期墨家，或归为法家。这些问题的存在给名家哲学研究带来了额外的困难。因此，必须首先对该论题的研究对象和范围进行明确界定。本书依照《艺文志》的记载，以邓析、惠施、尹文、公孙龙等四人的思想为基本研究对象和范围，探讨先秦名家学派的哲学思想。在关于争议问题的安排上，本书遵循“不能彻底证伪，就遵从古说”的原则。在关于邓析、尹文等人的学派归属问题上，本书依照《汉志》将其归为名家。在《邓析子》和《尹文子》的真伪问题上，本书既不认为其为伪书，亦不认为其全真，采取谨慎地、有选择性地引用的方法。

在研究过程中，本书所关注和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名家学派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是怎样的?
2. 名家学派经历了怎样的产生、发展、演变过程?
3. 名家学派包括哪些哲学家?其内部有哪些派别?
4. 名家四子的主要哲学思想和理论特色是什么?
5. 名家学派与其他各家的关系如何?
6. 名家思想中涉及哪些哲学问题?
7. 名家学派的理论特质与价值何在?
8. 名家哲学的历史地位与影响如何?
9. 名家哲学研究的当代意义有哪些?

本书以上述问题为主要研究范围,将名家学派置于先秦名辩思潮的发展趋势中,结合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分析其起源和发展脉络;对邓析、惠施、尹文、公孙龙的思想予以分别解读,展现名家四子各自的思想特色,揭示名家哲学的发展脉络;从比较的视域分析名家与儒、道、墨、法等主流学派哲学的异同;将名家四子思想视为一个整体,考察名家哲学中的存在论、认识论、方法论和语言哲学思想。总结名家哲学的理论特质和价值,考察名家哲学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分析其消亡的原因,并阐释名家哲学研究的当代意义。

二 研究方法

1. 背景分析法

名家作为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争鸣中的一个重要学术派别,其思想的发生、发展离不开具体的社会背景。要全面理解、把握名家哲学的精髓,必须将其还原到先秦大的历史背景下,根据先秦时期社会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生活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的发展状况,研究其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根据先秦哲学文化发展的大趋势来把握名家哲学的特点及其在先秦时期所处的历史地位。

2. 文本分析法

任何学术研究,都不能脱离其原始的文本材料,这是哲学研究过程中的第一手资料,也是最重要的资料。迄今为止对名家哲学的研究成果虽不像儒家、道家那样汗牛充栋,也算得上成果颇丰。清末民初以来对名家诸

子著作的辨伪、注解、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成为我们研究名家哲学的重要参考资料。然而这些毕竟只是二手研究资料，我们必须通过文本分析法，综合各家研究所长，对名家诸子的著作、先秦典籍中所见的对名家诸子的评论作出解读，形成自己一以贯之的理解线索，方能对名家哲学有深入的理解和把握。另外，名家著作除《公孙龙子》外，其他人的著作不是早已亡佚，就是真伪莫辨。在这种情况下文本分析法显得尤为重要。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要通过对原始文本的分析确定哪些是可信的资料，哪些资料不能采用。

3. 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研究法

名家诸子的哲学思想各有侧重点。他们之间也并非像儒家那样从孔子到孟子、荀子之间有确定的师承关系可考，也不像墨家那样是一个具有严密组织的学术和社会实践团体。因此必须在对名家诸子思想的具体分析的基础上，对他们的哲学思想进行综合研究，以求发现他们哲学思想上的共同点和贯穿在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确定名家之所以为名家学派，区别于儒、墨、道、法等其他各家哲学思想的理论特质。从分析与综合中窥探出名家学派所涉及的哲学问题。

4. 比较法

学术研究中，除了从内部进行分析外，还需要考察研究对象与外部思想之间的关系。比较法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方法。将名家学派作为一个整体，放置于其所处的历史坐标中，通过与同时代的其他各家的横向比较确定其“横坐标”；通过与其发展过程之前和之后的其他思想的纵向比较，确定其在历史发展中的“纵坐标”。通过这种坐标法的定位，在比较中凸显出名家哲学的理论特质，突出其在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给予名家学派一个全面的、客观的历史定位和评价。